



趙復三與夫人陳曉薈

再讀趙復三晚年書信有感

吳宗素

當今世人也許對趙復三的名字知之者不多，有必要引用維基百科的條文，作一簡介。

編者按：2015年7月15日，趙復三在美離世。趙復三是中國基督教三自運動的重要人物，後來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，對推動中國基督教學術研究作出重大貢獻。1989年「六四」後，他因公開譴責中國政府鎮壓學運，長期在海外居留，至死仍未能歸國。

吳宗素為中國基督教三自運動的發起人吳耀宗的兒子，本文是吳宗素對趙復三離世的感受，並附2009年12月18日趙致吳宗素夫婦的信函，有助我們了解趙復三晚年的思想片斷。

趙復三（1926－2015），上海人，1946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，隨後任職於北京基督教青年會。1950年7月，時任北京青年會副總幹事的趙復三，成為《三自宣言》的40名發起人之一。此後，趙復三出任中華聖公會牧師、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總幹事、燕京協和神學院教務長、北京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。

1964年夏，趙復三突然作為革命幹部奉命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，負責批判神學的任務（吳注：其批判的成果就是《基督教

史綱》，用楊真的筆名發表，1979年三聯書店發行）。從助理研究員、研究員、副所長，到1980年代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和黨委副書記，並與趙樸初、趙紫宸合稱中國大陸宗教學界的「三趙」之一。

1980年代，趙復三出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第三屆、第四屆副主席。

趙復三又在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、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外事委員會委員。又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派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，1989年六四事件後，趙復三在巴黎公開譴責中國政府動用軍隊鎮壓學生，1990年6月被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、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的職務。此後趙復三在美國南方一所大學任教。

趙復三退休後，與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退休部門主管陳曉薈結婚，定居耶魯，並翻譯《西方文化史》、《西方思想史》、《中國哲學史》等著作。

2015年7月15日，他在美國康州病逝，享年89歲。他的朋友，學者丁偉志、何方等人發佈訃告稱：「在長達26年流寓的晚年生活中，趙復三先生不計世事浮沉與榮辱得失……始終放心不下的是中國文化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命運。」「這樣一位終生熱愛祖國的人，卻最終未能葉落歸根，埋骨異邦，這不僅是他個人的不幸，也是他所在時代的不幸。」

1950年代初，我在北京燕京大學求學，因父親的關係（父親吳耀宗，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的創始人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歷屆常務委員），和復三開始有所交往。1951年，燕大肅清帝國主義化侵略，燕京宗教學院被列為重點，復三當時是北京基督教聯合會主席，被北京市委派來協助領



院的運動，我們接觸較多，但也沒有機會深談。但知道父親在重要會議上的發言稿，有時會徵求復三的意見。

1951年，英國大主教詹森訪華，在北京教會講道，趙復三即席翻譯。流暢，準確，對經文的引用嫺熟自如。那天的與會者至今依然津津樂道。

我畢業後，分配到福建教學，和復三分隔兩地，加上政治運動不斷，各人都有一條難走的路，和昔日的友人都失去了交往。

1989年六四後，復三流亡國外，最終落腳美國，我們又恢復了聯繫。雖然一東一西，但時有電話聯繫。他和友人魚雁往來，都會將影本寄給我和涂繼正。涂繼正的父親是涂羽卿，美國物理學博士，上海滬江大學教授，聖約翰大學校長，基督教全國青年協會總幹事，和趙復三的父親是留美同學。

六四，用復三自己的話，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分界線。

趙復三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，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求學期間，由抗日、反蔣而參加了革命。解放後，身不由己，被安排從事基督教工作，以

耗因腦癱，不能寫字。

每月腦力都衰退，想
由另寫信了。

復三

日 2.12.7

後官至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。1959年，開展「交心運動」，對黨忠誠老實，趙對反右、大躍進、反右傾，講了一些真話實話，被認為有「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」，文革時又被斷定是「長期潛伏的美蔣特務」，隔離交代。期間，「大哥自殺、二哥碎屍」（吳注：二哥趙中玉，燕京大學機械系畢業，分配到東北採煤，工作出色，意外去世，評為烈士。以後，他的岳父，中國籍美國人，南開大學教授，被誣為特務，趙中玉受牽連，屍骨從烈士公墓挖出，拋出牆外。受牽連的，還有趙復三）、母親孑然一身、孤苦病死」。文革後的1989年，趙率團赴法開會期間，爆發了「六四」。他不能認同當局用暴力鎮壓學生，決定滯留海外，潛心治學。近年來，作了很多反省反思，「覺今是而昨非」，重新認識基督教的價值。對1952年這段往事，作為當事人、見證人，卻始終保持沉默。

1952年這段往事，對瞭解基督教在肅清美帝文化侵略運動相當重要。運動如何佈局，如何鎖定趙紫宸（燕京宗教學院院長，基督重要支柱）作為鬥爭對象，如何決定撤銷宗教學院等等。趙是內幕知情人。2010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家父研討會的組織者邢福增教授，通過我和復三取得聯繫，寄去研

討會的全套檔，並希望專程來美採訪他。被趙婉拒。如今斯人西去，永遠帶走了這些寶貴的歷史資料。

復三去世後，我和涂繼正重新回顧了他的書信，深覺其中的真知灼見，字裡行間閃爍著智慧的火花，對國內國際事都有獨特的觀察。短短數年，特別是腦開刀後，健康每況愈下，還能堅持筆耕不已，難能可貴，足見思維依然活躍敏捷。但最後數年神志已開始逐步退化，電話中一再問我，母親楊醫生是否依然健在，健康如何。其實家母早在1984年已在京去世，追思禮拜還是由復三所主持。

八百多頁書信中，我認為，最具代表性的，應首推「歷史的沉思—《神曲》默想」，共11頁，寫於2006年3月，他的80歲生日。復三反思了我國人民以前所走過的道路，由地獄，到煉獄，到樂園的憧憬，又對祖國的未來進行批判性的思考。

書信的涵蓋面很廣，上至哲學宗教，下至政治社會的方方面面，趙都認真關切。讀者可流覽體會。這些都是在自由環境下的真實的思想。

趙復三已被革除所有官職，被打入另冊，寫此短文以表達對故友的懷念。

宗素、蕙心：

下午收到您們的賀年片、短信、像片和附寄胡績偉的文章。真是感激不盡。細看相片，宗素和六十年前的樣子沒有多少改變。附寄胡績偉的文章，是我所見的有關中國時論文章中最明快的一篇，曾任《人民日報》社社長的胡績偉，的確是「大手筆」，大快人心。再加上您在信中所說：吳耀宗先生是一位悲劇性的歷史人物，引起許多思緒。我想說的一句話就是：我們所生活過來的二十世紀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悲劇時代，吳先生是一個基督徒，卻又是這個世紀中國人民的一個代表。

二十多年前，八十年代前期，北京的空氣似乎比較寬舒，當時我還在北京，有一次和中央美術學院的吳作人先生在一起閑談，我說起，中國革命的領導人，似乎是由三部份人合成的，一部份是「五四」前後在法國和西歐（如朱德在德國）的知識份子，以周恩來、朱總、李富春、陳毅、聶榮臻等為代表；一部份是蘇聯十月革命後到俄國去的青年革命者，以劉少奇、楊尚昆為代表；還有一部份則是未曾出過國門的革命者，如毛澤東、林彪、王震；這三部份人合在一起，組成了中國革命領導集團。這三部份人，似乎都帶有各自的特點：第一部份革命者是到過西方，多少接受了近代西方思想的知識青年；第二部份人，只去過十月革命後的俄國，只知道斯大林主義；第三部份沒出過中國國門，只知道「打江山」、「坐江山」、做皇帝。如果以「現代化」作為標準來衡量一下，這三部份人中，哪一部份對中國的現代化做出最大的貢獻？恐怕還要說，是到法國去的那一批；而且，這一批人不僅對革命，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，如藝術方面，有徐悲鴻先生和吳作人先生、常書鴻先生等；自然科學方面如錢玄同先生的兒子錢

三強、他的夫人何澤慧與汪德培等；戲劇方面的李健吾；音樂方面如冼星海、馬思聰等。吳作人先生也這樣看。我問他，當時去法國的這批人，在去法國時，對中國、對自己的一生，有些甚麼想法？吳作人先生回答，只有一個籠統的想法：要為中國尋找一條出路。另外一個場合，我曾以同樣的問題，問錢三強的夫人何澤慧，她說，在法國，也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歐，經濟、社會都沒有出路，人們思想上十分苦悶。

這些閑談其實也反映我自己和我們這一代人的一個長期思想：我們有對一個美好社會的理想，對蔣介石鎮壓人民的民主運動是反對、以至反抗的；可是對「社會主義」是甚麼意思、俄國斯大林實行的是不是社會主義，毛澤東主張的「秦始皇加馬克思」是甚麼意思？秦始皇怎樣和馬克思加在一起是甚麼意思？等等，我不清楚；就這樣糊裡糊塗進入了新中國；幾十年也沒有真正弄清楚過。1949年《人民日報》上宣傳蘇聯的一個電影《庫班半島》，講蘇聯人們天天都像過年那樣吃喝玩樂。我看電影後，寫信問《人民日報》編輯部，蘇聯是不是這樣？革命是不是就意味著讓人人都天天吃喝玩樂，這是否就是人類的理想社會？作家蕭乾在1956至57年間說，不贊成社會主義社會實行「無產階級專政」，為此在反右運動時，蕭乾成了右派。報上發表後，我對北京宗教事務局局長說，蕭乾的這思想我也有，只是我沒有說。1958年人民公社興起時，北京政協組織各界社會人士到徐水縣人民公社參觀。我也去了。當時的口號說：「共產主義是天堂，人民公社是金橋」。我又對宗教局局長說，經過人民公社，就進入了天堂。對此我有懷疑；料想對三面紅旗，我曾提出過不少問題。就這樣，1959年，廬山會議後，上面反對彭、黃、張周反黨團，下面補劃「漏網右派」；在北京宗教界，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、對黨忠誠老實運動。在運



動中，要我交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和行動，否則就是對黨不忠誠老實。從此，我就成了人民的敵人；直到1962年我心肌梗塞、半夜送進醫院急救，那年我36歲。從此被排除出北京基督教會，養病兩年，被介紹到新成立的科學院「世界宗教研究所」，在一次會上，北大校長陸平決定，我先到山西，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，接受改造（當時陸平說，他也要下去改造思想；只是後來，宋等他下鄉，他已經被打倒，從此不知去向了）。

1966年文革開始時，我在山西農村被召回北京，參加文革。因為對文革不了解，反對把支部書記劃為「走資派」、「敵人」，才一個星期，就被造反派劃為「牛鬼蛇神」；住進了牛棚；「清理階級隊伍」時，軍宣隊長向群眾宣佈我是「證據確鑿，長期潛伏美蔣特務」，隔離反省，交待罪行。1970年，隨革命群眾，下放河南農村，長期改造。1971年林彪反黨案發。1972

年又隨哲學社會科學部大隊人馬回北京，76年毛澤東、周恩來、朱德先後去世；四人幫被逮捕。1978年底，中共會議宣佈文革結束。鄧小平任總書記，宣佈不要再講「姓資」、「姓社」。沒有人宣佈對我「平反」，我歷時十餘年的「特務」案件，未經定罪入獄，也未經「平反」，群眾不明不白，我則自己「解放」了自己，不了了之。

1977年，在胡喬木主持下成立與中國科學院並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，胡喬木任院長。1978年鄧小平主政後，胡喬木調中央，國務院副秘書長馬洪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任院長。1985年胡繩任院長，我主持常務（下設科研局、人事局、外事局、老幹部局），還和錢鍾書、李慎之、劉國光分別負責社會科學、文史哲、國際關係、經濟（除從中央研究院繼承的經濟研究所外，增設了工業經濟、農業經濟、財貿、世界經濟與政治等學科）四大片、三十三個研究所，一個與各學科合作，招收1000學前的研究生院、一個《中國社會科學》雜誌社，一出版社。到1989年「六四」前，做了四件事情：一是聯合各大學、各政府部門的研究機構，制定「全國社會科學研究五年規劃」；二是進行改革，把原由院部統管的科研、人事、預算、國際學術交流轉交各研究所自行管理，並把改革方案推進到各國各省市社會科學院；三是貫徹「開放」方針，每年派出500名科研人員到國外考察進修，接收500名外國科研人員來中國研究進修；四是端正學風，改進科研制度（首先是加強社會調查），改善科研人員生活待遇和醫療、住房條件、旅行條件等。我自己除在研究生院教課外，還跑西北、西南少數民族地區，寫了一篇論文，題目是〈究竟怎樣認識宗教的本質〉，內容是說「宗教不是鴉片，而是各民族文化的儲存所」，1988年在《中國社會科學》雜誌上發表，被中央統戰部主管宗教的副部長把

我告到主管領導那裡。1989年「六四」，我正在巴黎開會，申明不同意「六四」，中國政府鎮壓人民；從此退職移居國外，直到如今。回顧二十歲大學畢業迄今，將近64年，在基督教界工作18年，在學術界25年，在國外20年，自問還沒有做過違反中國人民利益的任何事情。這二十年來在國外，給我的一個好處是把中國和世界聯繫起來，從世界和中國的比較和關係中來進一步認識中國，從中體會到：

1. 在歐亞這塊古老的大陸上，居於東段的有四個民族：日本、朝鮮、中國和蒙古。中國雖是一個文明古國，比巴比倫、埃及、印度文化，還是後起的。四百年來，中國是落後於世界的。落後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：落後而不自知，只認為是中國國情特殊，意味著中國不以為意，還打算長此落後下去。而現實情況是：日本與韓國已經走到中國前面去了，南亞、西亞、中亞則已趕上來了。
2. 六十年來，中國人的思想是：「立足中國，放眼世界」；把這稱為「立場」，就是說，這是不能動搖的。我推測，這是毛澤東制定的。如果與時代相聯繫，則這是「五四」時代中國人的見解。經過二十世紀，經過世界範圍內的兩次世界大戰，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運用核武器和自動運載工具，人類能在戰爭中互相毀滅。在這樣的世界裡，現在興起「全球化」，這是人類避免自我毀滅的唯一光明前途。要「全球化」，首先就是思想上，從全世界的發展看自身的發展，要求自身的發展能夠跟上世界的發展。這是中國前途之所寄。現在中國的「國情特殊論」是和「全球化」對抗的一種危險理論。
3. 世界歷史表明：人類分成不同的民族，由於地理條件不同，不同民族的經濟發展和生活

方式會有差異。不同民族在互相接觸中，學習不同民族的經驗，取長補短，由此促進了文化的發展，這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經道路。

4. 歐洲和亞洲地理環境不同，歐洲的許多民族，與西亞的許多民族，從古代以來就有許多接觸，中國的漢族其實是大族群，是漢族和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，這些民族吸收（漢民族和東亞其他民族交流的文化經驗，是另一個研究領域）漢民族的經驗，從中又發展了他們自己的（日本的、韓國的）經驗；但是中國吸收其他民族經驗的機會就少了；相反，倒助長了中國的文化自大感，阻礙了中國的進步。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相比較，從多年的學習裡，我覺得，西方人的精神狀態，至少有兩個與中國人不同，比中國人強的地方：(1)中國人講「知足常樂」的多，西方人則強調「不怕艱難，不斷進取」的多；(2)中國人講「和諧」（如從前中國哲學學會會長、北京大學的張岱年教授認為：「和為貴」是中國文化的精神）；西方則偏重講「愛憎要分明」、「是非要分明」。
5. 民族不分大小，重要的是它的內在精神力量。歐洲歷史和中國歷史對比，一個顯著的不同是：歐洲的歷史是由許多民族共同形成的。古希臘是一個分散在許多島嶼的沿海民族，羅馬是繼伊特斯卡(Etruscans)人之後進入意大利半島的一個民族，羅馬人繼承了伊特斯卡人的文化（如由一到十二的計數方法），形成了羅馬的文化。英倫三島上，起初是盎格利亞人(Anglia)，至於薩克遜人(Saxons)是日耳曼人的另一支；愛爾蘭人則是凱爾特人(Celts)；蘇格蘭人則是從斯坎德納維亞半島下來的維京人(Vikings)。法國人是凱爾

6. 西方以基督教作為「天人合一」的精神力量，形成西方人的世界觀。中國人則從來相信「天人合一」；只是道家相信，「人法道」，最終是人歸於自然，儒家則相信人本主義，人是從人而明白「天道」。這本來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天人

兩重性，有「生」，就有「死」，而且，生和死是連在一起的；有「樂」就有「哀」，「樂極」就「生悲」。由事物地兩重性裡，就蘊含著事物的不斷而無窮的變化。西方人對未知世界敢於「探險」，敢於干預，敢於改變，和這種人與自然合一、「天人合一」的世界觀是關聯在一起的。毛澤東思想認為「人定勝天」，一切由人做主。「大躍進」，餓死三千萬人；文化大革命，鬥爭打

擊上億人；打擊敢於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，都是以這種思想為依據的。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質。

從二十年
來的學習，我



從這裡看西方歷史，法國大革命後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口號響遍歐洲，但是，一八零幾年，拿破倫又當上了皇帝！而直到今日，法國大革命之後二百多年，還有不少法國人把拿破倫當作法國的民族英雄。今日歐洲國家已經結成「歐洲聯盟」(European Union)；按說，十九世紀的「民族主義」、「國家主義」的觀念，已經過時，但是人們的頭腦裡，還是被過去的觀念束縛，這似乎是人類社會常有的事情。在德國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魏瑪共和國之後，繼之而起的是1928年納粹主義的興起。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大屠殺，在歐洲人頭腦裡記憶猶新，而新的「反猶主義」似乎又在歐洲各地悄悄興起了。正如今日中國又在興起一樣。你我都不是在中國，在西方，信息比較自由（也不是絕對自由），人們思想比較自由，行動的選擇也比較自由，因此我們比在中國的人們感到自由；交換思想，也比較自由。你們想，是不是這樣？

自1964年，我在北京，被「送出了」基督教界，而且很快被派下鄉改造，如果還與基督教界保持聯繫，就成了我的「陰謀」活動。我自己的事情（例如：我怎麼變成了「長期潛伏的美蔣特務」），我和上海以至全國基督教界可以說是基本隔絕的。文革之後，我問在聖約翰時期、跟徐懷啟教授一起念書的同學「師兄」、中華聖公會總幹事鄭建業主教，關於上海和全國基督教界在文革時期的情況，他只是歎氣、搖頭。好朋友所傷心歎氣的事情，我怎麼能死死追問呢。後來不久，他就病倒，成了「植物人」，後來就去世了。因此，對吳耀宗先生晚年的遭遇，我完全不知道。上面所說，只是我個人的遭遇。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一頁；它又是和二十世紀的歷史相聯繫的。因此，在信的開頭處我說，二十世紀這個戰爭與革命的大轉變時期，是個悲劇的時代。我們兩代人經歷了這個時代，也可以說，這

不僅是兩代人的經歷，但所經歷的，還只是時代的一角而已。

展望新年和自己的將來，只有兩點是確定的：(1)傳統的世界和美國政治格局，已經沒法維持下去了；傳統的中國政治格局，在人們心裡也已經破碎了；(2)外部世界如此，我自己立身所恃以為據的，只有兩個東西：一是六十年前留下一個知識結構，早已過時了。二是父母給我的物質身體，也老化了；而且自去年春腦溢血後，體力、腦子的近期記憶力都日漸衰退。這個趨勢大概還會繼續下去。為放出淤血，腦殼上打了四個洞，這四個洞疤還會長期留在頭上：我就此成了「趙四戒」。給自己開玩笑，我的四戒，第一戒就是「一切行動聽指揮」，樣樣事，要靠曉蕾提醒、驗證；第二戒，就是不能仰愧於天，一息尚存，不能泄氣；要樂觀，要前進。第三戒，就是年老，不能自以為有，自以為知，自以為是。第四戒就是以腦袋上開了洞的四個洞疤為提醒，一切抱開放態度。對世界的未來，我抱開放態度；對中國的未來，也抱開放態度；對自己的身體、生命，也抱開放態度。這樣，日持四戒，樂觀前行。從小跟著母親，母親常說：「甚麼事，都要有頭有尾。」廣東人吃飯、愛喝湯；喝湯重在頭一口，和最後一口，這是品味道的時候。做人大概也一樣，這最後一段，是品味道的時候。我已經到了品味道的时候了。

信寫後太長了，思緒卻似乎更長。人就是這樣，和歷史割不斷。年紀大，記性又差，努力想記得的，偏偏記不起來，這是上了年紀以後的矛盾之一。希望你們比我好。我現在看所有比我年輕的，都衷心羨慕。祝願你們

新年快樂 健康長壽

復三稽首

曉蕾并此

2009年12月18日